

周易函書約存卷十四

禮部左侍郎胡煦

原古 冒道分派

樂律

周

易

函

書

〔清〕胡煦著

律呂聲音幾表

呂覽含少三寸

程林分點校九陰

推自符

律娶妻呂生子

以辟卦證之始

明詳後

附卜法詳考等四种

第一册

樂律

易学典籍选刊



中华书局

易学典籍选刊

周易函書

附卜法详考等四种

〔清〕胡煦著 程林点校

第一册

周易函书约存十八卷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易函书:附卜法详考等四种/(清)胡煦著;程林
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8.8

(易学典籍选刊)

ISBN 978 - 7 - 101 - 06048 - 5

I. 周… II. ①胡…②程… III. 周易 - 研究
IV. 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8376 号

书 名 周易函书附卜法详考等四种(全四册)

著 者 (清)胡 煦

点 校 者 程 林

丛 书 名 易学典籍选刊

责任编辑 贾元苏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48¼ 插页 8 字数 1200 千字

印 数 1 - 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6048 - 5

定 价 128.00 元

序

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在明清之际发生了转折,由元明的空疏之学转入经世致用的实学,提倡返求六经,重视经典的原义,反对空谈。这一时期为汉宋兼采之学,代表人物为顾炎武、王夫之。与上述背景相适应,在易学领域,也对宋代易学进行了批评,尤其是对图书派的批评,主要代表人物有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等人,其倾向是向汉易回归。但是也有一批汉宋兼采的学者,对宋学既有所批评,也有所继承,如孙奇逢、汤斌、李光地、胡煦等人。

整个清代的学术思想是围绕着汉学、宋学之争展开的,迭回迁变,后人褒贬不一,至今未有定论。清人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是为西汉今文之学。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由此看来,清代学术走上了一条回溯之路。“学愈古”实然,“义愈高”则未然。乾嘉汉学炽盛之时,章学诚对此已有微言,主张通经明道,实事求是,折衷汉宋,以救时弊。庄存与、刘逢禄所领导的“常州学派”借今文经学别开途径,要将学术融入现实社会政治之中,成为晚清改革派的思想先驱,已是借汉学之名而与宋学殊途同归了。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清代学

术的一条内在理路,汉宋之争更应该看作是清代思想史内部的一种转变、发展和综合,而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所持的那种坚守汉学门户,坚决反对宋代义理之学的态度应该改变了。

《周易函书》是清初康熙、雍正年间著名的易学家胡煦的著作,共五十二卷,体例庞大,思想精深,被收入《四库全书》,是清代一部重要的易学名著。胡煦是清初一位有影响的易学家、理学家,他的思想有很多独到之处,对《周易》尤为精通。他的思想兼综汉宋,折衷程、朱、陆、王,对朱熹有所批评,其独特的易学、理学思想在清代易学史、思想史上有重要的价值。胡煦对历代易学进行了总结,对各种易说提出了自己的评价,着重阐发了《周易》中的哲学思想,他所创立的一套宇宙生成论哲学“极精极谛,古所未有”(牟宗三语)。他对《周易》图书学中的数理思想、象数思想都有非常精到的阐发,往往深造自得。胡煦的易学思想对熊十力、牟宗三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胡煦的“用九用六说”对熊十力的乾元用九、生生不息的思想有直接的关系,胡煦对朱熹的批评与牟宗三对朱熹的批评有相同之处。但由于人们对胡煦的易学思想了解不多,往往忽视了这种影响。

胡煦易学思想在生前已颇受人推崇,康熙帝多次召见胡煦,问卦爻中疑义,赞叹胡煦“真苦心读书人也!”胡煦曾为乾隆帝的老师,乾隆帝命收集胡煦遗著,入选《四库全书》。后又特命追谥,称“原任礼部侍郎胡煦苦志读书,究心理学”。其后的易学家如江永、焦循等人均对胡煦的易学思想有所借鉴。近代著名的易学家杭辛斋、尚秉和对胡煦的易学也都有所继承。马一浮在《复性书院讲录》中列胡煦的《周易函书》为易类必读书。熊十力亦多次提到胡煦的著作,称胡煦确有一位哲学家的头脑。牟宗三称胡煦为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并称:“此人有哲学头脑,这个人没有旁人注意到,是我首先发现的。”认为胡煦的思想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有系统最有见解的思想体系。

清代易学极有成就,但对其研究却相对薄弱。对清代易学家的

研究仅仅集中于几家,而又注重在义理方面,这是不能客观反映清代易学的实际的。胡煦是清初一位易学大家,他的易学思想在易学史、哲学史上极有价值,但长期以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易学著作未经整理,阅读不便,以至他的易学思想不能为人们所认识,因此对他的易学著作进行整理是一件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整理出版胡煦的易学著作《周易函书》,对胡煦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一项迫切的任务,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近年来海内外对胡煦思想的研究逐渐增多。台湾辅仁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均有学者完成了关于胡煦易学研究的博士论文;在国内,胡煦易学思想研究获批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周易函书》点校整理也获批了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重点科研项目。这些都反映了对胡煦研究的不断深入,是一个可喜的现象。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位重要的易学家。

程林同志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期间是我的学生,他积数年之力,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了这部近百万字古籍的点校整理,非常难能可贵。今著作出版之际,索序于我,我作如上观感,以为序。

李中华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于北京大学

前 言

胡煦生于清初,一生精研《周易》,兼采汉宋,融贯象数义理,提出了很多深刻独到的思想。张之洞《书目答问》列胡煦为汉宋兼采之经学家,谓其“博综众说,确有心得者”。胡煦笃志圣贤之学,读书求经世致用,平生精力尽萃于《易》,往往深造自得,多先儒所未及,实为清初思深见卓之易学家、理学家。他反对先儒支离旁杂、乖谬附会之说,力求建立一个通贯的解《易》系统,于汉宋易说颇多发明质证,探赜索隐,有独创之处。以下主要从文献的角度,对胡煦的生平著述及影响略作考释,对其主要的学术思想进行初步的论述。

一、胡煦的生平及其影响

胡煦,字沧晓,号紫弦,河南光山人。清顺治十二年(1655)生,乾隆元年(1736)卒。胡煦“少笃志儒先之学,读书求经世实用。八岁见太极图有阴阳纠缠循环回抱之势,思之寝食俱捐。及长,工诗古文辞,淹通经义,尤深于《易》”(乾隆五十一年《光山县志》卷二十七)。“年十八,志益奋,功益专,凡古人说《易》之书,靡不甄综,以求融合四圣之旨,遂以易学终其身”(钱陈群《礼部侍郎胡公神道碑》)。

康熙二十三年(1684),胡煦乡试中举,此后仍居乡里,潜心学问。三十五年,参修《光山县志》。四十二年,授安阳教谕,悉心濂洛之学,品行端恪。五十一年登进士,年已五十八岁矣。选庶吉士,授

检讨。臚传时引见澹宁宫，以所著《周易函书》陈奏，曰：“圣人之道尽在《周易》，臣学之四十馀年，于伏羲先天圆图似有体会。”康熙帝叩以河洛理数，胡煦条对甚悉。时大学士李光地易理精详，廷臣未有出其右者，康熙帝令李光地与之讲《易》，胡煦所言无以难也。后复召见乾清宫，画图讲《易》，问答数千言，康熙帝顾侍臣曰：“真苦心读书人也。”（《光山县志》卷二十七）命直南书房，同李光地分纂《周易折中》。五十四年充会试同考官。五十六年与修《卜筮精蕴》，典湖广乡试。先是试官由九卿保举，至胡煦典试，康熙帝问左右，谕曰：“朕止信得此人。”由是廷议引重。五十七年迁司经局洗马，修《卜筮汇义》，后任鸿臚寺少卿。六十一年迁光禄寺少卿，又迁鸿臚寺卿。雍正元年（1723）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二年命祭告少昊等陵，充顺天武乡试副考官。五年迁兵部右侍郎，兼署户部侍郎。六年协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又署刑部右侍郎，教习庶吉士。七年典顺天武乡试。八年上书房行走，教授皇子，充《明史》总裁官，会试知贡举。九年转礼部左侍郎，旋以年老罢归。乾隆元年（1736）胡煦入觐召见，复原衔，荫一子入监读书，是年九月，卒于京师，年八十有二，赐赙祭有加礼。

胡煦正直忠厚，在职有所论奏，不为虚美避就之，言大要主于本教化，慎刑谏，劝农桑，广言路，省冗官，多切于世务。乾隆二十五年（1760），河南巡抚胡宝瑑疏请入祀乡贤祠。三十七年诏征天下遗书，乾隆帝习知胡煦为中州理学醇儒，尤精邃于《易》，特谕：“原任侍郎胡煦平素究心理学，曾有著述，朕所深知。”传谕河南巡抚“悉心寻求，汇单具奏”（清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七十一）。胡煦子胡季堂时官江苏按察使，以其父所著《周易函书约存》十八卷、《约注》十八卷、《别集》十六卷、《卜法详考》四卷校定，由原籍汇奏，入选《四库全书》。五十九年（1794）乾隆帝谕：“原任礼部侍郎胡煦苦志读书，究心理学。”特命追谥，谥号“文良”，“以示眷念耆旧，奖励儒臣至意”。（《胡季堂奏折》）

胡煦家世寒微，平日苦心读书，自少至老，未尝废学。积学嗜

古,穷经析理,生平著述不下数百卷。胡煦生前已颇受人推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对这位老臣均优待有加。康熙帝多次召见胡煦,问卦爻中疑义,命画图以讲,对其赞赏有加。胡煦曾为乾隆帝的老师,胡煦去世后,乾隆帝命收集其遗著,入选《四库全书》,后又特命追谥。尚书钱陈群谓:“间尝窃论我朝文治蔚兴,名公卿比肩林立,求其有体有用、本末可观出处,一揆则于中州得数焉。汤文正、张清恪其选也,继之者厥惟宗伯紫弦先生。”(《光山县志》卷二十二)。又在《礼部左侍郎胡公神道碑》中称:“馆选时自称能通《周易》,时大学士李文贞公易理精详,廷臣未有出其右者,圣祖命与先生讲《易》,无以难也。屡蒙召问,三接于澹宁宫。甲午同杨公名时召见乾清宫,画图讲《易》,问答数千言,有‘苦心读书人’之褒。”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煦研思易理,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其持论酌于汉学、宋学之间,与朱子颇有异同。”(卷六)。《光山县志》称:“自昔解《易》,未有若是其详者。故于汉宋诸儒博采其说,而参以心所独得,尚书钱陈群以谓其书博无涯涘,而深造自得、不蹈先儒臼窠者也。”(卷二十七)。彭启丰《葆璞堂文集序》称:“先生论《易》,有《函书》九十九卷,博综象数,辨析异同,一本其所自得,要皆原本于道,平正通达,可以见之行事。其与张孝先、冉永光论《易》书,阐图书之蕴,昭晰无疑,后之学者尤宜究心焉。”(《光山县志》卷二十二)。钱陈群《葆璞堂诗集序》称:“盖其深嗜笃好,有寤寐羲文于千载之上者。故持论不主一家,而出其自得,往往不惜与先儒辨难。尝曰:‘吾背传也,而不敢背经。’”(《光山县志》卷二十二)。毕沅《葆璞堂诗集序》称:“荟萃甚博,折衷甚精,言理不失之晦,言数不失之凿。”(《光山县志》卷二十二)。李去侈称:“大抵先生之于《易》也,豁达而不流于旷渺,精深而不泥于训诂,博采而不役于方技,凡皆默符四圣心原,通达旨趣,故能搜奇探赜,致远钩深,而详人所略,凿凿言之有若斯也。”(《周易函书序》)。

著名新儒家大师牟宗三先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一面读怀特海,一面读《易经》,并由此发掘了胡

煦的思想。他说：“《易经》所启发的自然哲学，发展到最高峰，是清朝初年的《易经》专家胡煦。此人有哲学头脑，这个人没有旁人注意到，是我首先发现的。”（《牟宗三学术文化随笔》）。他在评论清代学术时说：“清人考据训诂，于学术道术无足称，而惟于易学，则得两人焉：一曰胡煦，一曰焦循。此两人确是不凡，都可以说是易学专家。”（《牟宗三学术文化随笔》）。一九三二年，牟宗三完成了《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一书（此书原名为《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元学及道德哲学》，一九八八年再版时改为今名）。该书在第三部分专论“清胡煦的生成哲学之易学”。牟宗三认为胡煦通过《周易》建立了一套很严密、很精深的生成哲学（也称自然哲学、数理哲学、科学哲学、宇宙论），胡煦的生成哲学一贯而系统，能克服汉《易》附会之说的弊病，对《周易》的理解更自然，更妥贴，更通贯，显示出中国思想中客观、条理、科学的一面。牟宗三对胡煦极为推崇，认为“胡煦是中国的最大哲学家，且在中国，除公孙龙外，唯有他始足称哲学这个名目”（《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

牟宗三认为，《周易》一书确实涵有很深刻的宇宙论思想，胡煦的《周易函书》在这方面确实有独到的发挥、见解，自成一套系统的自然哲学。牟宗三对此作了极致的发掘，不无所据，甚有价值。在西方哲学的背景下，牟宗三对胡煦易学思想的发掘是深刻独到的，具有比较哲学的味道。其《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一书，旨在发现中国思想中的科学精神，他在胡煦的思想中看到了这种精神，并对胡煦的思想系统予以阐发。

熊十力先生在自己的著作和书信中，也多次提到胡煦，称赞胡煦的思想精深新颖。他说：“清世《易》家，独胡煦犹存宋学一脉，其《周易函书》颇有新意，足以羽翼前贤，治《易》者不可不究心于此书也。”（《熊十力全集》第3卷）。胡煦对清代思想家以及熊十力、牟宗三等学者的影响，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胡煦的著述及其版本

胡煦的《周易函书》体例庞大,思想精深,收入《四库全书》,堪称清代不可多得的一部易学名著。胡煦著此书,积学四十余年,十数易稿,成书三千页,约字一百八九十万。因卷帙浩繁,无力刊刻,辄摘其要义,名《约存》《约注》《别集》刊行于世。

《周易函书》原稿一百十八卷,分《正集》九十九卷和《别集》十九卷。《正集》九十九卷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有《原图》《原卦》《原爻》《原古》共五十卷;第二部分主要诠释经文,共四十九卷。《别集》分为《函书约》三卷、《易学须知》三卷、《易解辨异》三卷、《篝灯约旨》十卷,共十九卷。这是《周易函书》的最早定型情况,其成书不迟于康熙五十年。李去侈《周易函书序》作于康熙五十年孟秋,称“其书《正集》《别集》一百十八卷”;胡煦所作《自序》在康熙四十九年,足证此书应完成于康熙五十年之前。此时胡煦尚未中进士,《周易函书》止为手稿。

由于《周易函书》卷帙浩繁,艰于剞劂,胡煦于雍正二年才完成《别集》十九卷的刊版。随后取《正集》中第二部分诠释经文者四十九卷,约为十八卷,名曰《约注》,于雍正七年刊版。又将《正集》中第一部分《原图》《原卦》《原爻》《原古》五十卷,约为十六卷,另附《续约旨》二卷,名曰《续集》,共十八卷,于雍正九年刊版。此为《周易函书》的最早刻本,有《别集》十九卷、《约注》十八卷、《续集》十八卷,共五十五卷,它只是原著的一个精简本,为胡煦生前亲手所订,且在雍正九年前均已完成。这个刻本我们称之为初刻本。

关于《周易函书》的卷数,有一百十八卷和一百五十八卷两种说法。李去侈《序》称“其书《正集》《别集》一百十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是书原本一百十八卷”,彭启丰所作《墓志铭》称:“公所为《周易函书》,列四大门,曰《原图》,曰《原卦》,曰《原爻》,曰《原古》,凡五十卷,又释经文四十九卷,为《正集》;外有《约图》三卷、《孔朱辨异》(即《易解辨异》)三卷、《易学须知》三卷、《篝灯约旨》十

卷、《续约旨》二卷、《卜法详考》四卷，为《别集》；又《约注》十八卷，《续集》十六卷，总一百五十八卷。”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一百五十八卷之说是指在一百十八卷的基础上，加上后来的《约注》十八卷，《续集》十八卷，及另外一部著作《卜法详考》四卷，合之成一百五十八卷。彭元瑞在《墓补志》中专门对彭启丰所作墓志中一百五十八卷的说法作了解释：“前志公所著《周易函书》一百五十八卷，时初敕征，校刊未卒事。盖公书始以授门人李学裕，失其稿。公贫不能全镌，粗举其约，又岁久漫漶，至是季堂乃就公手定本镌为五十二卷上之，今藏七阁者是也，详见《四库提要》。后之读公书者，毋以志疑之。”因此两种说法虽异，而实相同，且今之存世者仅五十二卷之《周易函书》而已。亦有《周易函书》五十六卷之说，这是因为将《卜法详考》四卷附于《周易函书》之后，合之五十六卷，而实不类。《四库全书》已将其分列，置《卜法详考》于术数类。就今之所见本来看，当以《周易函书》五十二卷的说法为确。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唐鉴《国朝学案小识》称“《周易函书约存》二十四卷，《约注》十八卷，《别集》八卷”的说法，均是错误的。唐鉴大约依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讹传讹。

胡煦生前，由于家贫力微，《函书正集》九十九卷仅为手稿，未能刊刻。胡煦门人李学裕携其稿去，欲将《函书正集》校刊印行，后学裕病卒，此事未遂，手稿也散佚无存。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胡煦子胡季堂根据仅存的初刻本，对《别集》十九卷、《约注》十八卷、《续集》十八卷重为校订刊刻。胡季堂对各卷的内容作了调整，并有一些增删和改动。具体情况是：《约注》十八卷未作变动；将《续集》更名为《约存》，且将《续集》中的《续约旨》（即《续篝灯约旨》）二卷的内容拆散附于《别集》的《篝灯约旨》各卷之中，《篝灯约旨》仍为十卷。又将《续集》余下的十六卷合为十五卷，将《别集》中的《函书约》三卷移入，成《约存》十八卷。《别集》编为《易学须知》三卷、《易解辨异》三卷、《篝灯约旨》十卷，共十六卷。是为乾隆三十七年葆璞堂刻本，我们称之为葆璞堂本。

乾隆三十七年,开四库馆,因胡煦与乾隆帝有师生之谊,乾隆帝命河南巡抚何焯收集胡煦遗著,胡季堂即以重新校订刊刻之葆璞堂本《周易函书》呈送。今之所见《四库全书》中的《周易函书》即以葆璞堂本为底本抄写的,我们称之为**四库本**。

由于葆璞堂本刊刻仓促,可能有不少错讹。后来胡季堂又对葆璞堂本进行了一些补改,时断时续,直至乾隆六十年左右。这些修改都是在原版的基础上进行的,并非重新雕版,这个修订本,我们称之为**葆璞堂修补本**。

因此,关于《周易函书》的版本情况,我们认为先后存在着四种版本,即胡煦生前的初刻本,乾隆三十七年的葆璞堂本,四库本,以及乾隆六十年的葆璞堂修补本。今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周易函书别集》雍正二年刻本,《周易函书约注》雍正七年刻本,经笔者检核皆不是,而应为葆璞堂修补本。又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周易函书》五十二卷,标示为乾隆三十七年葆璞堂刻本,经笔者检核亦不是,亦应为葆璞堂修补本。据笔者检索,《周易函书》的初刻本、葆璞堂本均已不存,所能见者,仅为四库本及葆璞堂修补本,如此,四库本就成了现存的最早的本子了。

以上是关于《周易函书》的版本流传情况,再谈一谈四库本和葆璞堂修补本的差异情况。由于四库本和葆璞堂修补本都来自葆璞堂本,两本大体上还是比较一致的,但仍然存在一些差异。究其原因,一是四库本抄写错误,一是葆璞堂修补本后来补改。四库本的抄写者在抄写过程中有误字、漏字,也有颠倒及遗漏句、节的情况;抄写者有时也将原本中的错字进行了改正,这些情况通过与葆璞堂修补本对比后可以看出。葆璞堂修补本是在葆璞堂本的基础上进行的一些补改,这些补改主要是对误字、漏字的修正,但有一些是胡季堂对内容方面的有意修改。由于胡煦对朱熹有很激烈的批评,在四库本中有关“朱子”“本义”的词,在葆璞堂修补本中大多改成了“先儒”“后儒”,这些改动是胡季堂为了避免直接批评朱熹而有意为之,这也说明朱熹的权威在清代仍然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所

以,在《周易函书》的整理中,我们以葆璞堂修补本(简称“堂本”)为底本,以四库全书本(简称“库本”)为参校本,在校对中尽量将两本的差异以校记的形式指出来,以供读者参考。

胡煦一生著述颇多,除《周易函书》外,尚涉及数学、音韵、农务、诗文等方面。

胡煦的《卜法详考》四卷作于雍正六年,原附于《周易函书》中,收入《四库全书》时,编者将其与《周易函书》分开,归于术数类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盖古占法之传于今,与今占法之不悖于理者,大略已具于此。虽非《周官·太卜》之旧,然较之卜肆鄙俚之本,则具有条理。其驳唐李华、明季本、杨时乔卜用生龟之说,亦极为明析。存此一家,亦可以见古人钻灼之梗概也。旧附所纂《周易函书》中,考其所说,与解《易》之书究为不类,今别著录于术数家焉。”其书考辨古今卜法,极为详备。《卜法详考》的版本现存有乾隆三十七年葆璞堂刻本和四库全书本。但四库馆臣在将《卜法详考》四卷抄入《四库全书》时,不知何故,擅自改为八卷,将原卷一分为卷一、卷二,原卷二改为卷三,原卷三分为卷四、卷五、卷六,原卷四分为卷七、卷八。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卜法详考》四卷,又与所改不一致。

《葆璞堂诗集》四卷,《葆璞堂文集》四卷,胡煦生前并未刊刻。胡煦一生专精于《易》,诗文无暇汇集刊版,残编剩简,几至散佚。其子胡季堂自服官后,留心搜辑,或从先世故交得见手泽,或于名贤文集获有馀篇,随时录存,汇成草册,编次其目,付以刊刻。此书现存有乾隆三十七年(1772)葆璞堂刻本。

此外,胡煦还有《农田要务稿》不分卷,存有稿本;《勾股算术》二卷,存有抄本;《韵玉函书》五卷,存有抄本;《澹宁三接始末》一卷,存有抄本;《乾清官召对始末》一卷,存有抄本。其它还有与李光地分纂的《周易折中》和参修的《卜筮精蕴》《卜筮汇义》。其著述存世可考者如此。

三、胡煦主要的学术思想

胡煦是清初一位有独到见解的易学家,他考镜源流,参以心得,深契易理。他根据《周易》建立的一套很精深的生成论哲学,不仅具有解经的意义,更含有哲学的意味。他提出的“体卦主爻说”比较严密地说明了卦爻的生成与变化,对《周易》中“内外往来,上下终始”的解释更为合理,更为贯通,从根本上纠正了“卦变说”与“错综说”之误,在易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胡煦认为不论是三画卦还是六画卦,皆是代表着阴阳往来流行,它们组成一个有主次等级秩序的体系,有其内在的结构性,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是杂乱无章的。在所有卦中,乾、坤为大父母,具有主宰的地位,其它各卦皆从乾、坤而来,莫不具有乾、坤之体,因此皆以乾、坤为体卦。不论是八卦还是六十四卦,除乾、坤、泰、否外,每卦必有主爻,主爻决定着该卦的性质。在三画卦中,主爻为每卦三爻中独异之一爻。此独异之一爻,非阳九用于坤,即阴六用于乾。因六画卦由内外两个三画卦组成,其主爻即是内外两个三画卦的主爻,因此六画卦除乾、坤、泰、否外,均有一个或两个主爻。《彖传》中“往来内外”皆是指主爻而言。乾、坤为体,九、六为用,体用同源,显微无间,絪縕交感,往来变化,遂成六十四卦。这就是胡煦的“体卦主爻说”。

在六画卦中,除乾、坤、泰、否外,其余六十卦皆有主爻,其主爻亦根据内外两个三画卦的主爻来判断。因此这六十卦每卦均有一个或两个主爻,而该卦的性质即是由主爻决定的。胡煦认为《彖辞》大多是解释主爻的,因此用他的“体卦主爻说”来解释《周易》,以前卦变说解不通的地方,就能得到很好的解释了。他的解释与经传文如合符节,入丝合扣,且更能发挥经传中的义理。牟宗三称赞“胡煦以体卦说注解经文,极为恰当,不见斧凿之痕。其发明体卦说,于自然生成之理,极有悟解。因此对于‘初、上、九、六、二、三、四、五’八字命爻之义,解之极精极谛,古所未有”(《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

义》)。吕绍刚也称：“他提出的体卦主爻说，彻底推翻了卦变说，在易学史上是一大发明，一大贡献，他的易学地位应在来知德、焦循之上。”（《周易的哲学精神》）

胡煦的这一学说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向壁虚构，乃是他反复钻研《周易》经文，并总结前人的一些思想，博综众说，参以心得，实有发明，而成一家之学说。

胡煦反对用卦变说解《易》，他认为执卦变说者由于不明“往来”二字之含义，以内外卦阴阳两爻互换为往来之意，而对整个经文的理解产生了错误。如果不纠正卦变说的错误，整个《周易》将无真解。胡煦认为卦变说的解释不能贯通全部六十四卦。胡煦根据他的体卦主爻说，对六十四卦一一重新作出解释，他的解释颇能使卦象、卦辞、彖传相互吻合，彼此发明印证，豁然贯通而不悖谬。胡煦之说非常精到，发前人之未发，释从来之疑义，使人感到《周易》之理之文简单之极、透彻之至，真所谓易简易知矣。吕绍刚称赞胡煦：“发前人所未发，用体卦主爻说解释《彖传》中‘上下往来、内外终始’八字，至为正确。胡煦终于推倒了千百年来众人纷纷质疑却一直推不倒的卦变说。”（《周易的哲学精神》）

胡煦也批评了来知德的错综说。他认为来知德所提出的错综说，本来是为了批评卦变说的错误，但来氏由于不明往来之旨，其说反而愈离愈远。错综说以初上、二五、三四两爻互相颠倒而为往来，是未明《彖辞》中“往来”的真正涵义。因为“来”是指主爻交于内卦，“往”则是主爻交于外卦，非两卦颠倒为“往来”。

胡煦认为错综说古已有之，错即古代所谓伏，综即古代所谓覆。古人借此只是观象之法，非成卦之法。依错综说，如两卦相综则有三对爻互为往来，来氏未明体卦主爻之说，其不知往来只是对内外卦主爻而言，误认卦中各爻皆可往来，实误之误也。观《彖辞》可知，《周易》中论往来之语从未有言主爻之外者，此证错综说不符经文。

自从来知德提出错综说之后，来氏自视甚高，后人附和者亦众。

但错综说的缺陷亦是明显的。首先相综两卦以生成而论,谁先谁后不知,两卦可以互相生成,不合道理。其次相综两卦有三对爻互为往来,无有主次,此实不明往来只是对主爻而言。所以胡煦认为来氏的错综说只可用作观象之法,不可说作生成之理,他批评来氏于本源有所未探。这一批评是允当的,也是深刻的。

胡煦以河图洛书为《易》之大原,他虽以象数解《易》,却意在阐发天人合一之旨。河洛说自宋代出现以来,流行颇广,影响甚大。到了清初,则受到极大的怀疑,黄宗羲、黄宗炎、胡渭等人均对其提出了批评,认为河洛说不是《周易》本旨,而是来自道教的传授系统。胡煦则以河图洛书作为解释《周易》的基础,把它看作是整个《周易》的根本。胡煦认为河图洛书本原于天,为天地自然之易,天以图显示于人,图书所呈现的天地自然之理无不赅备,圣人则而画卦,一以贯之,皆以明天人合一之旨。

胡煦认为全部《周易》之奥妙尽涵河图洛书之中,二者有一合一分,一体一用,一先天一后天之妙。他所说的先天是指无形无象、万理静涵,还未分化的世界,他喻为未发之中,实是指流行不息之天理。天理流行,万物化醇,有形有状,此为后天。胡煦把河图看作先天,洛书看作后天,以表达他的宇宙生成观。他认为从河图中可以看出万物生成之理,先天即万物之先机,属未发之中,未发之时,合而未分。此时万物不可见其形,而可体其理,这是先天之妙。他认为全部《周易》卦爻,俱是先天,因此解《易》要明天道,要探本溯源,而不可仅向人事吉凶上求证。

胡煦解《易》的方法是由数而象而理,把图、卦、卦辞、爻辞、传看作一个整体,不可拆开来讲,也不可互相矛盾抵触。他认为图象为《易》之根本,能包含无遗,义理附于图象,应据象而言理,不可分作两开,仅据人事或仅以言辞而言理是片面的。他反对前人解《易》支离旁杂、乖谬附会之说。他说:“《周易》止卦爻之设,而图象实括始终本末之全,会图征象而至理斯存,未有弃图置象而孤标至理者也。夫图象犹形也,理犹影也,影即形而存,无形而影于何起? 图象犹日